

廣州文史資料

選 輯
第三十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州文史资料

选 辑

第 三 十 一 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4年3月

封面题字：胡根天

封面设计：何世德

广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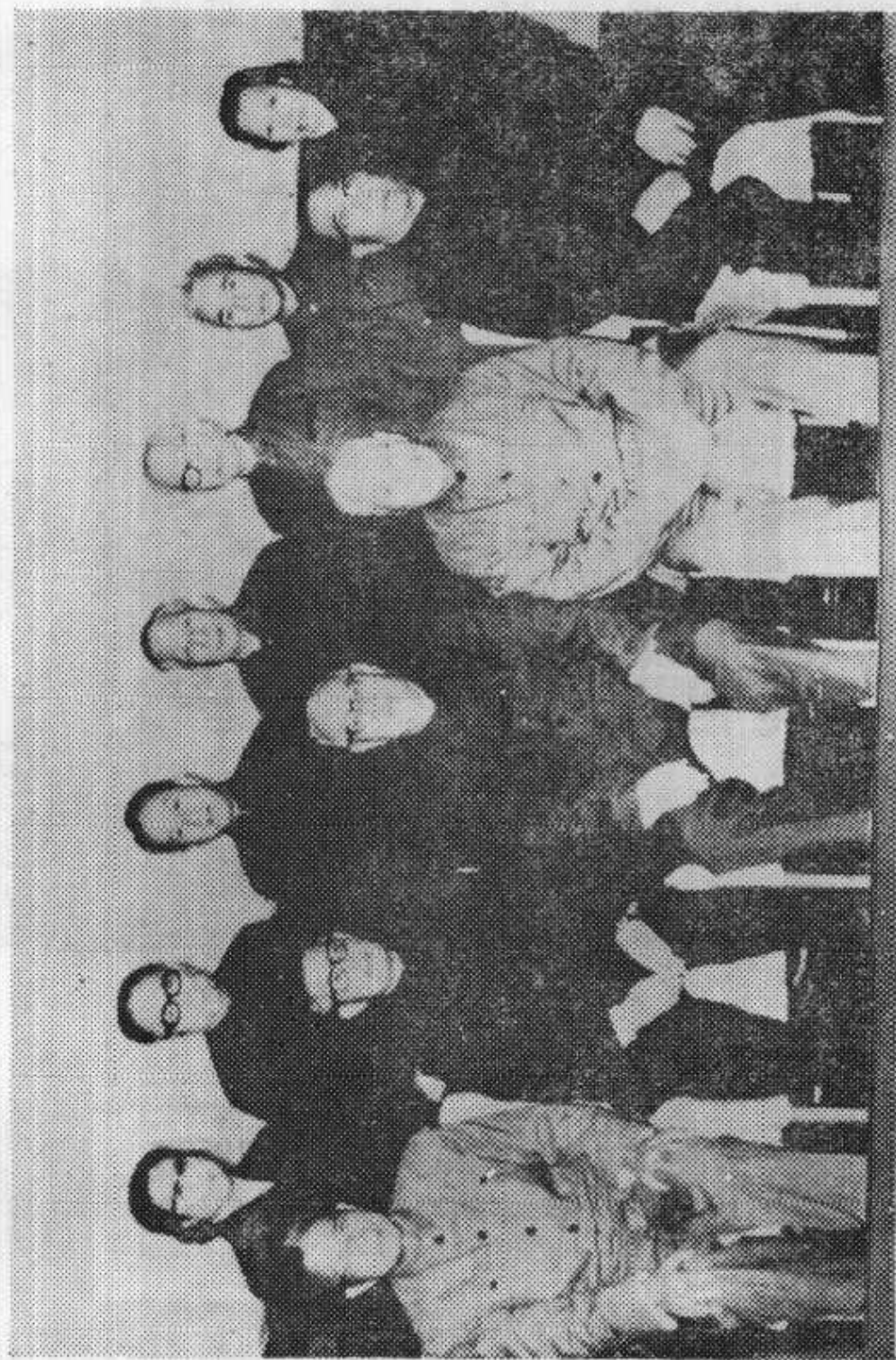
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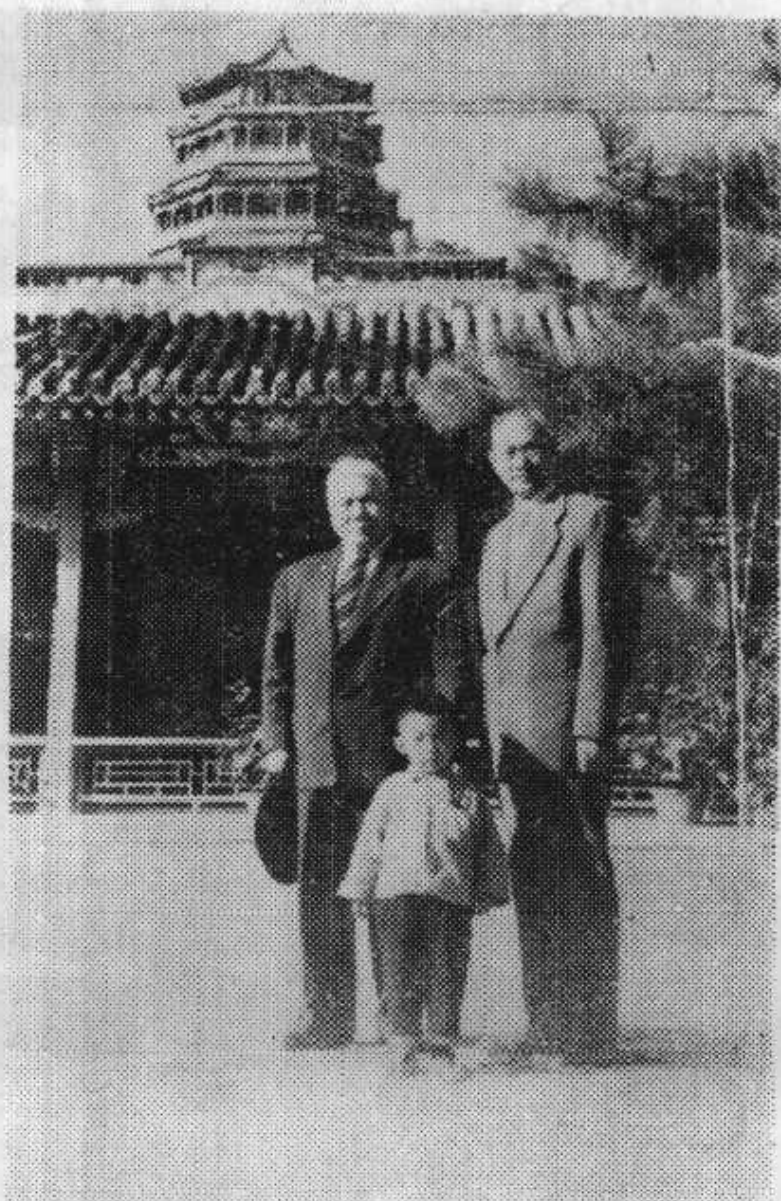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32开插页2页 8.625印张 175,700字

1984年3月 印数1—6,000册

书号 11111.131 定价1.55元



叶剑英(一排中)莫雄(一排右第二人)等同志1978年10月于北京合影



英雄(左)与梁明德(项与年)于1956年
10月2日在北京颐和园合影

目 录

我与共产党合作的回忆…………… 莫 雄(1)

广州市警察局部分人员起义回忆

…………… 市参事室文史工作组(39)

九龙海关护关斗争与迎接解放……………凌 宵(94)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增城……………陈冠中(112)

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工作的回忆

……………徐亮 杨荃(126)

奔向延安……………徐辛雷(134)

一份未出版的地下报纸……………理 明(142)

南澳之战——广东抗战第一枪……………李友庄(147)

南粤战车队的由来和消失……………刘 焯(157)

南京突围及广东队伍收容经过……………李益三(165)

沦陷期间沙坪封锁线的“大天二”和游击商

……………李泮安(182)

广州洋染料业……………李泮安(193)

广州搭棚业……………梁 源(207)

陈祥记棚铺的经营特点.....梁 源(230)

广州制革业今昔陈庆年(239)

我所知道的广州市酸枝家具业.....唐 明(252)

番禺县鸦湖华侨和华侨幸福会

.....叶越人 叶仲雅(256)

新发现郭沫若给梁寒操的一首诗张克坚(266)

对《广东儿童教养院始末记》一文的订正

..... 李小松(268)

我与共产党合作的回忆

莫 雄 口 述

莫栋梁、陈耀之、丘一中记录整理

开始做朋友

1928年，张发奎为李济深所反击，退出广州，投靠蒋介石。不久，又在湖北宜昌反蒋，旋即失败，逃抵广西，联合李宗仁，出师东下，企图夺取广州。抵达广州近郊白云山附近时，张部有两个师为蒋介石收买，阵前倒戈，李、张联军溃败，逃返广西。

我当时任张部新编薛岳第二师第三团团长。出发进攻广州前，奉张命到广东组织“别动军”，张、李兵败，我立即遣散别动军，也回到广西。

1930年底，我感到跟随张发奎没有什么出路，便跑到上海，见到宋子文，当时宋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给我以财政部视察的职务。蒋介石却忙于屠杀革命人民，国民党人大都拜倒蒋介石脚下，但也有人坚决反蒋的，如何香凝、邓演达等。全国人民寄希望于共产党。

我的财政部视察，是一个挂名领干薪的官儿，终日闲荡。恰好碰到旧部刘哑佛，他是安徽合肥人。1925年我任建国粤军第十一师师长时，由同盟会会员金维复等给我介绍认

识的。当时我见他头脑新颖，思想进步，就任他做我师的政治部主任。但共事不到一个月，我师为蒋介石所缴械，便分开了。这次上海重逢，欣然道故，十分高兴。从此他常到我寓所闲谈，并介绍严希纯（解放后任全国计量局局长）、项与年（真名梁明德，解放后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华克之（解放后在国务院外交部任职）以及袁良邹、何文凤、莫钺等同志与我往来。我感到他们都是朝气蓬勃、革命精神充沛的人，我和他们相处，极感愉快。他们常把革命道理讲给我听，从言谈中发觉他们有崇高的理想和渊博的学问，使我非常拜服。他们又把苏联革命的经过，详细给我介绍，还把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和当前革命的形势，讲给我知道。我真是顿开茅塞，对他们更加爱重。互相之间，情感更笃。他们知道我在国民党中资格老，社交广。就请我设法保释几个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我也愿为之奔走。便去找当时上海警察局长文鸿恩，文与我素有交情，在我请求和劝说下，便把几个在狱的共产党员释放了。刘哑佛等很感激我。我当时非常倾慕共产党，极想参加党，请严希纯作介绍人，严请示上级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李克农。李叫严转知我说：“莫先生是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想参加共产党，党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格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不参加党为好。今后参加党的机会很多，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凡对党有利的事，望莫先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共产党，能做到这样，我们就十分满意了。”我听后，觉得很有道理，极为高兴。表示就这样办。

上海抗战

我在上海（1930—1934），还接触到一帮“政学系”人物，首脑是杨永泰、张群，其中还有国民党实力分子，如海军司令李根源、陕西都督李震华、贵州省长吴鼎昌等。杨永泰是广东茂名人，早与我认识。因我在1922年率第七独立旅在他家乡茂名高州等九个县肃清盘踞在那里的陈炯明三万多残部，又击溃了有二万之众的黄明堂。我旅纪律严明，不伤老百姓，故杨很佩服我。杨在上海见到我时，曾拿出他的《削藩论》给我看。这篇《削藩论》是剽窃日本大臣伊藤博文献给日本天皇的一部著作，杨将它改头换面作为自己的著作。把当时各地方军阀矛盾冲突的情况，研究分析后，提出外交上倒张作霖；政治上倒汪精卫；军事上倒阎锡山、冯玉祥；经济上倒张发奎、李宗仁；以蒋介石一统天下为张本的策略。这叫“四大纲要”，献给蒋介石。蒋如获至宝，立即委杨为侍从室秘书长，从此杨得到蒋的宠爱。杨为了炫耀自己，又表示对我的尊重，因而特意给我看这本《削藩论》。我看后假意表示十分赞赏。

1932年1月28日，上海抗战开始了。全国同仇敌忾。

一天深夜，宋子文派他的亲信陆文澜、张海安用小汽车来接我。他们说宋要我去接张远南税警总团第三团团长职务。张远南是宋子文妻舅，恃势获罪于陆文澜、张海安，陆、张便向宋子文搬弄是非，说张远南曾对守卫太阳庙的士兵说：“如果日本仔打来了，便从墙洞中逃走。”宋子文怕这

话传出去对自己不利，故惺惺作态，要撤张远南职，并将我提升为该团团长，带兵打仗，为他捞取政治资本。税警总团第三团是实力雄厚的一个团，有四、五千人，其中有二千广东兵，干部都是张发奎第四军旧部。我见到宋子文，宋把要我当该团团长的意思也说了。我说：“现在正在打仗，阵前撤军官职，影响不好，且张团长又是你的至戚，马上撤他的职，面子上也不好看。”我还表示可以在税警总团做个参议，若第三团有战事，可到那里指挥，平时则在总团长黄赓身边帮下忙。总团长黄赓当时亦在座，他平日对张远南也很讨厌，认为如果撤了张的职，不让张吃点日本人的苦头，是便宜了他。黄赓赞同我做他的参议，（其实心中另有盘算）宋子文同意了。我到徐家汇税警总团驻地时，黄赓在总团参谋长以及八处处长们的座谈会上介绍我和他们认识，说：“莫先生是孙总理的信徒，是第四军名将，又是宋部长的老朋友，现部长派莫先生到我团部参与打日本仔，你们应该把他看作是我一样，听他的便是听我的。”讲完后，他又将机密文件和地图等交给我，旋即收拾行李，作远走状。我很是惊异，即问黄赓：“这是干什么？”黄掏出几张在美国大使馆任职武官的美国“西点”大学同学名片（黄曾留学西点），说要去美领事馆探望他们。说完便离去，我送他出门到花园小径上，他扶着我的肩膀边行边说：“莫大哥！你这次来，真是太好机会了。”我诧异地问他：“这话怎么说？”他说：“过两天你就知道了。”说完神秘一笑。以后才体会到，黄怕和日本打仗，先溜开，我会代他当总团长。

两天后，黄赓穿着毕挺的黑色西服，乘三轮摩托车到了

日租界美领事馆，出来后，又到“礼查”英国饭店找他前妻陆小曼，黄还不知道这间饭店已为日军占领，改为日军司令部了。黄深度近视，直到大门口，见守门的是日本兵，大吃一惊，不知所以，想从另一门口进去，及至发现所有门口均有日军守卫时，才恍然大悟，慌忙逃走。日军见状，便将他拘捕了。第二天，在日本报纸上，用特大标题报道“阵前俘虏国民党将军黄赓”，并将黄照片附在报上。宋子文得知此事，大发雷霆。通过各国外交团体，费了很多手脚，才把黄赓弄了出来。宋对他申斥一顿，后把他送进监狱。黄入狱后，宋子文把我提升为税警总团长。我上任后，马上通知上海正在抗战中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等。我又立即派税警团第二团在庙行阵地抗击日军。两星期后，在一次战斗中，该团利用装满泥沙的麻包作为掩体，向日军进攻。日军用重炮集中轰击，不到两个钟头，该团阵地全毁，死伤七百余人。我便指挥士兵继续作战。当年放映一部记录片《中华光荣史》，便有我骑马指挥作战的一些镜头。

不久，日军在浏河登陆，直插十九路军后方，该军总指挥蒋光鼐在掩蔽部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全线转移，我们税警总团被指定驻在松江、青浦。当抗战部队撤下以后，蒋介石立即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协定”。蒋介石这种投降卖国的勾当，激起了全国人民无比的愤怒。

宋子文“反蒋”

上海停战以后，税警总团进驻海州。此处为有名的“淮

盐”产地，但盐梟为患已有百年。他们勾结地方豪强、贪污官吏，破坏盐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匪首白宝山，当过北洋军阀的师长，与我相识。他有二万多人，拥有轻、重机枪和其他武器。他与上海青红帮杜月笙和国民党中央孙科等有勾结，势力很大。曾把驻在那里的中央军独立第六师（师长王若周）迫走，独霸一方。我向宋子文建议，把这盐梟肃清，以利税收，宋答应了。我又考虑他们有孙科等背景，怕清剿会招致“越权”的责难，我便电报蒋介石，说明此处匪患情况与清剿意见，请求委我以剿匪之责，蒋接电后，正式委我为“淮徐地区剿匪总司令。”

1932年9月，我把盐梟据点全部攻下，捉到匪头目及不法官吏（其中包括县长，县公安局长等）八十余人，匪首白宝山逃走了。我决定把这些匪盗问斩，在行刑前，接到孙科（行政院长）和杜月笙的电报，请求我释放几个头目。我虽与孙、杜有交情，但我还是把他们一律杀掉，复电孙、杜，谓接电过迟，已经把他们杀了。从此淮徐地区安静，税收由每年十几万元突增至八百万元，我受到传令嘉奖。海州百姓也非常欢喜，在海州为我立碑称颂。

税警总团从此名气大了，宋子文这时已经有独树一帜与蒋争衡取而代之的企图。美国也想用宋子文代替蒋介石以达到奴役中国的目的，也就积极支持宋子文。宋乃大量扩充税警团，使整个编制膨胀到三个师的兵力，全部美式装备，有九个德国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税警总团下辖五个团。每团足五千人。排的编制为十八个班，每班配有轻机一挺，每排又有一个六〇炮班。总团直属的还有高炮、山炮、特务、通

讯、运输、卫生等七个直属营。每个团还有一个手枪连。宋子文按照美国意旨，准备打起“倒蒋抗日”旗号，由美国供应五百架飞机，各方面大事扩充。这时我奉宋子文之命在苏北云台山下修建60华里长的大型飞机场。不久，宋子文要我去欧洲考察军事，税警总团团长由过去做过总团长的温应星接任。宋给我五千元大洋作治装费，要我很快起程。但等了多日，没有消息，护照也未交来。找宋询问，宋装作忘记，反劝我不要急，要我先与陈济棠、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系，以为将来反蒋之计。我知宋的用心，一则要我出洋，将税警总团交回其心腹温应星；二则利用我的关系与当时反蒋的杂牌部队联系，作为外援。我答应为他效力。是年冬，宋几次秘密往返北平，与在北平的张学良密商，决计联合反蒋。宋命令温应星把驻陇海铁路以东的几万名税警总团部队乘火车开赴北平，准备用“请蒋下野，以清君侧”的名义反蒋。但行军目标极大，引起在郑州的河南省主席刘峙的注意。刘问温应星此行奉谁命令？温答奉宋之命。刘即用长途电话告知在保定忙于剿共的蒋介石，蒋获电急令温：“没有军事委员会命令，任何部队不得私自调动。你部火速返原驻地待命。”蒋又对沿线部队下令作好战斗准备。温见势不妙，只好将部队退回海州。过了数日，蒋探知宋子文与张学良“联合倒蒋”计划。心中大怒，但也不敢深责宋、张。因宋掌握蒋的经济命脉，又有美国后台；张学良又拥有几十万东北军，各有力量。故蒋只得找来宋、张，抛售其“先安内，后攘外”的所谓理论，宋、张因事已败露，无可如何。宋只得借口出洋考察经济，张则借口到意大利考察军事。宋子文

委托我联系各方面的事，也没有去做。一场反蒋计划行动，便烟消云散了。

牯岭会议

1933年10月我在上海闲居无聊，便到江西南昌找薛岳，薛当时任江西“剿共”部队第二路军总指挥。早在广东驱逐龙济光时期，我与薛已认识，后来他任张发奎部下的旅长，在张联合李宗仁、陈济棠“反蒋”失败，薛离开张，蛰居香港，这时，薛岳先后受到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以及南京蒋介石的邀请，但未作出到那方面去的决定，正踌躇间，我在港见到薛岳，他问我应到那方面去为好。我劝他到最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去。广西地瘠人穷，广东地方狭小，而南京长江一带，正是鲲鹏展翅之所，大有可为。薛听从我的话，即到南京依附蒋介石。蒋没有实践他给薛任第五军军长的许诺，只给他副职，薛甚失望，打算离开，我见到他，又劝他忍耐等待。不久，薛果然飞黄腾达，一跃而为蒋手下反共的悍将。这时，我去找他，他对我极其客气，招待我住在南昌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办事处内。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在百花洲花园，逢到杨永泰，杨见到我，十分高兴，即邀我到他家里，在他家见到陈布雷、陈方子、罗坤强等八名他的机要秘书，我也是认识他们的。杨要我住在他家，这个家就是他的办事处，他在二楼办公，从不让别人进去的，但对我却特别青睐，任我自由出入。我又在此住了约一个月。一天，杨亲热的与我谈话，说知道我向与蒋介石很好，表示愿意替我向

蒋“搭线”；他告诉我，现在江西分区成立“剿共”保安司令部及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他准备推荐我担任专员和保安司令。我当时表示感激。过两天，杨带来蒋介石给我的委任状和组织表，一份是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委任状，一份是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委任状。再看两份组织表，都是空白的。我说：“杨公（杨别号）！承你介绍，让我当上了这两个官，可是怎么一个人也不给我呵？”杨永泰笑着说：“我一个人都不介绍给你，你自己去找吧！”言下之意，是对我极大信任。他还递了一张五千元大洋支票给我，说是“蒋委员长亲自批的。”似要我向蒋感激知遇之恩。当我走出杨永泰住宅时，心里很不平静。我想：世界上那有这样便宜的事？把官送到手里，还把钱送来，蒋、杨为什么如此厚待我呢？无非是想我为他们的反革命卖命。难道用五千元就能收买了我吗？我倒觉有些反感。我又想到，现在让我做“剿共”的官，就是做刽子手去屠杀共产党，屠杀工农，我若出卖良心依了他们，我岂不成了孙中山的叛徒？这正是我深恶痛绝之事。但委任状已接了，怎么办呢？我产生一个强烈的念头，我何不趁这机会，让共产党来当这个“剿共”保安司令的家吧！蒋介石“剿共”，我就保共、通共。我想起在上海认识的几个共产党员，于是我立即到上海，找到严希纯、刘哑佛、华克之等几个共产党员朋友，将两份委任状及组织表交给他们看，并告知经过。我说：“我相信孙中山三大政策，这是可以救国强国的；而蒋介石反共剿共是要亡国的。蒋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但做的却是叛徒的事，我岂能为虎作伥。我对你们共产党人很佩服，相信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你们说应该怎么

办呢？严、刘等人听后，互相对看一番，没有立刻答覆。我见状，便更加明确地端出自己心事说：“你们不讲，让我讲，我要用蒋介石的拳头打他自己。你们把这两份东西拿回去和上级商量研究，假如信得过我莫雄，请你们派些党员来与我一同干吧！我当司令，你们来当我的部下，他要‘剿共’，我要剿蒋。”他们听罢，十分高兴。由严希纯接过我的委任状和将两份组织表带走了。1934年3月底，我负责的江西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以及负责的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班子，在上海地下党的研究安排下组成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由胡毅、陈修爵担任，参谋长卢志英（又名卢涛，1948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情报参谋项与年，情报组长贾绍谊（又名贾作，解放后任四川长寿县狮子招待所所长）；专署主任秘书刘哑佛，专署文教科科长阮退之（解放后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任科员薛代旦（曾任中共广东顺德县县委第一书记，组织被破坏后逃到上海），科员丘镛（烈士），科长傅肖先（解放后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人。这都是中共上海党组织研究商讨后派来的。组织表上介绍的几十名同志，大多数是共产党员，除了项与年、刘哑佛两人外，其余我都没有见过。他们和我很快就到江西就任。其中陈修爵副司令不知什么原因，很快又由上海地下党调走了，我到南昌由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拨三个保安团给我。这个江西第四保安司令部和行政专员公署设在江西德安。这地方位于南浔铁路中段，按蒋介石说法，这里是红军活动最“猖獗”的地方。我就任后，在司令部内秘密活动的党组织马上与当地红军及苏维埃政权取得联系。在共产党的巧妙安排